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By Jian Chen.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416 pp., 17 illus., 1 table, 4 maps, notes, bibl., index.

張淑雅\*

過去十幾年間，也就是從蘇聯解體前後、冷戰接近尾聲開始，國際間重新掀起冷戰史研究的高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大陸、蘇聯，以及東歐國家官方檔案之陸續開放或出版，冷戰史研究乃從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中心的外交史，轉變成利用多國檔案來作研究的「冷戰國際關係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或稱為「新冷戰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透過新檔案與各國學者的合作，將冷戰史研究的角度、深度均大幅拓展，將冷戰期間國際關係的解釋，從單純權力平衡的兩極衝突，逐漸帶入權力多極化、多面向衝突的層次。

作為冷戰史研究一環的中共對外關係，十幾年來由於大陸官方檔案選擇性的開放，在大陸學者（留學加上本土）的參與合作下，不但在國際學術界激起研究熱潮，也促進了大陸相關研究的蓬勃發展。<sup>1</sup>本書作者陳兼正是目前活躍在西方（與中國大陸）的中國籍冷戰史學者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出身上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於2003年6月5日「1950年代的海峽兩岸」研究群討論會報告。

<sup>1</sup> 大陸學者將新冷戰史稱為「冷戰史新研究」。沈志華，〈冷戰史新研究與檔案文獻的收集和利用〉（《歷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1期）一文，對這十幾年來中共、蘇聯與東歐檔案開放，以及國際合作與著作出版的情形，有非常詳盡且系統的介紹。另請參見陳兼、余偉民，〈「冷戰史新研究」：源起、學術特徵及其批判〉（《歷史研究（北京）》，2003年第3期）一文。

海華東師範大學，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目前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嚴家淦講座教授，也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紫江特聘教授。他曾獲得華府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資助，將許多出版的中文檔案或資料翻譯成英文，透過該中心的《冷戰國際關係史計畫學報》(*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與系列研究報告(working papers)發表，或另外結集出版。<sup>2</sup>

本書結集了作者數年來已經發表過的主題論文，與其他針對此書所寫的專題論文共九篇，加上討論主要論點的前言，和討論後冷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及可能發展的後記兩章。各章主題均是長久以來冷戰史學者研究與爭辯的焦點與最關心的議題，即「失去的機會」之論辯（美國是否坐失及早與中共建交的良機，討論中共自內戰到建國初期的對外關係，共兩章）、介入韓戰與越戰的曲折（共三章）、發動與結束台海危機（八二三砲戰）的因由（僅一章）、中蘇分合因由探討（共兩章），以及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開端（僅一章）。

此書利用了 1980 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陸續出版的大量檔案，包括中共黨內文獻、領導人的作品與回憶錄、口述歷史等等，以及作者在各地地方檔案館所蒐集到的政策執行資料，還綜合了過去十數年來許多利用中共檔案的研究成果。紮實的研究加上清楚的論點，更有別於前人的解釋，使美國學界對此書無論在研究、分析與解釋上的貢獻，均有非常高的評價，認為無論是對冷戰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或者是對專題研究者，都是一本必讀的書。本書亦因而在美國被許多冷戰史課程採用為教科書。<sup>3</sup>書後的參考資料介紹，則簡要描述使用的原始資料內容與各主題的研究成果，對進一步從事此主題

<sup>2</sup> 有關陳兼與威爾遜合作翻譯與研究的成果，可以查該中心的網站：[http://wwics.si.edu/index.cfm?fuseaction=topics.home&topic\\_id=1409](http://wwics.si.edu/index.cfm?fuseaction=topics.home&topic_id=1409)。

<sup>3</sup> 見 June Grasso 與 Marc Gallicchio 的書評，分別刊登在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4 (October 2002), pp. 1204-1207 及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6:2 (April 2002), pp. 623-625。林霖(Arthur Waldron)讚譽此書為經典之作，為這個主題的研究樹立了新的里程碑。見 Arthur Waldro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Orbis* 46:2 (Spring 2002), pp. 391-407。

研究者，很有參考價值。

本書的焦點有三：作者首先指出中國在冷戰中的地位是中央而非邊陲，因中國將冷戰的實際焦點轉至亞洲，使冷戰不致變成熱戰。此外，因毛澤東提出中間地帶理論，把冷戰與去殖民化相連結，將反殖民主義加入原只強調階級革命的共黨集團意識及冷戰語言之中，導致意識形態衝突的尖銳化，讓當時美蘇兩個超級強國都不能忽視中國。

其次，作者強調意識形態在冷戰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檔案開放之後，冷戰史家大抵認為各國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關注，遠遠超過意識形態優劣的爭論，並紛紛以安全利益的考量作為研究中國外交的基點。陳兼則認為意識形態對冷戰的發展非常重要，除了共產與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外，共黨各國基於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在解釋與實踐馬列主義上多有分歧，故馬列主義不僅造成共黨陣營的團結，也造成其分裂（頁 6）。雖然如此，貫穿本書各章的「意識形態」，主要並不是指馬列主義，而是陳兼所強調中國人（包括民眾與領導人）在對外關係上的「受害者心態」(victim mentality)。他認為中國過去的中心地位，使中國人自認為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屈辱，遠大於其他一樣受到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人們認為毛的革命藍圖能讓中國強盛，恢復其世界中心的地位，因此願意支持極端極權的外交決策過程。而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人，除了有類似的受害心態外，也善於利用人民此種心態，藉著挑起或加深外在危機，來動員人民支持內部革命。例如，利用台海危機動員支持大躍進、利用越戰動員內部發動文化大革命等。但他們也因受害心態的助威，而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故在冷戰中屢屢選擇使用武力，以維護國家安全與領土主權的完整。

最後，本書分析毛澤東時代對外的行為模式，指出毛在世時，完全主導中國內外的決策，故要了解中共的「革命外交」，必須先了解毛因「後革命焦慮」(post-revolutionary anxiety)所產生的「繼續革命」(continuous revolution)理論。毛認為革命的目的在于轉化中國，成為一個普世正義與平等的國家，讓

中國革命作其他國家革命的楷模，進而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故在建國之後仍要「繼續革命」。毛澤東常運用國際緊張局勢來動員國內，以執行他轉化國家、社會的「繼續革命」，這就是作者所謂的「革命外交」。當毛與其他中共領導階層、甚至人民之間的緊張升高時，革命外交政策就變成毛維持其威權與繼續革命正當性的唯一有效工具。陳兼從毛時代的對外行為往下推演，認為「中國內政的關懷，無論是在毛澤東時代或之後，都主導了其對外關係。」（頁 279）

作者文筆流利，敘事簡潔，密切結合分析與敘述，並一再強調其中心論點，讓讀者對他的解釋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仔細比對各章敘事細節及其論點，仍可發現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看外交與內政的關係。陳兼指出毛澤東所刻意製造出來的台海危機，在大躍進這齣戲裡扮演的角色，就像京劇的鑼鼓點，缺了鑼鼓點，整齣戲的節奏與戲劇感都會喪失，也就沒有演出的價值（頁 203）。在陳兼的描述中，毛時代的中國對外政策，包括主動與被動的運用武力、製造或者擴大危機，也都只是毛因為後革命焦慮症所衍生出的「繼續革命」大戲裡的鑼鼓點，目的只在維持這部大戲的節奏與戲劇感，而其終極目標則是在治療中國十九世紀以來受帝國主義侵略屈辱而造成的受害者心態，恢復中國過往的榮耀與世界中心的地位。筆者的疑問是：倘若所有外交行動都只是設計來當內政的「鑼鼓點」，本身沒有獨立明確的目標可言，則又如何能如毛所願，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中心地位，以慰藉「受害者心態」？就實際需要來說，對外行動必須要有針對性的策略與技巧，才能透過行動，在國際上爭取較高的發言份量，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或敬畏。從實際行動來看，中共建國之後，不斷努力的目標就是爭取國際社會的接受：從韓戰停戰談判、1954 年日內瓦會議與 1955 年萬隆會議的中共外交表現，提倡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爭取與美國談判的管道、自詡為第三世界代言人、中蘇論戰，甚至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等等，都是為了提升國際形象與地位的外交作為，怎能說這些政策的「主

要目標」只是爲了推動國內的某些政策？

當然，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孟子也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政府利用外患來鞏固內部的支持，達到推行內部政策的計畫，中外皆然。如 Thomas J. Christensen 指稱，美國與中共在 1950 年代的對抗中，不斷利用危機以達到國內動員的目的。<sup>4</sup>近來外交史家也同意，大部份國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植根於國內因素；<sup>5</sup>但利用國際局勢展開國內宣傳，以推行內政計畫，應屬於內政的範疇。中共利用抗美援朝、絞索政策、援越抗美等對外事件的宣傳活動，進行國內動員，以推動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等政策均毋庸置疑，但此或可說是毛澤東非常善於利用國際局勢的發展（甚至藉著煽動人民的「受害者心態」）推動內政，很難直接導致中共是爲了推動國內政策，而去製造國際事端的結論。如果毛發動危機的主要目標真是爲了國內動員需求，他如何有把握完全掌控危機的發展，不致玩火過度，造成內政外交的雙重損傷？舉例來說，陳兼強調，毛最終發動 1958 年炮擊金門的合理解釋，是爲了大躍進動員需要，果如其說，則毛就不必猶豫再三，推遲炮擊的時機（頁 175-181）；更何況作者還引毛澤東自己的話說，決定 8 月 23 日發動炮擊，是因爲之前三天聯合國決議要求美英從中東撤軍，更凸顯美國佔領台灣的不義，所以炮擊金門正是時機（頁 182）。

作者似乎假設，毛自認爲透過外交危機動員國內的成效很好，所以才會一而再地使用這個伎倆。這豈不是說，假設沒有外在危機，毛的政策就無法貫徹（或者是會遭到很大的阻力）。這樣的假設，似乎忽略了共黨中國自有一套政策執行體系與動員的方法。例如，在延安時期的整風，並沒有藉外在危機來動員。<sup>6</sup>可見外在危機可以作爲動員的助力，卻未必是爲了動員才刻意

<sup>4</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5</sup> Frank Ninkovich, "Where Have All the Realists Gone?" *Diplomatic History* 26:1 (winter 2002), pp. 137-142.

<sup>6</sup> 陳永發指出，中共屢試不爽的動員辦法，是「階級鬥爭的群眾路線」，即透過各級黨委，調動並發揮老百姓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熱誠，爲美好的明天犧牲今天，並透過響應號召的積極

去發動危機。換句話說，作者對於中共外交與內政關係的解釋，有點因果倒置。

至於意識形態與安全考量在中共外交決策中孰輕孰重的問題，亦有待商榷。的確，從冷戰到後冷戰時期有關中共對外關係的解釋，一般都落入二分法中，不是認為中共以意識形態掛帥，志在輸出革命、赤化世界，就是認為中共與世界衝突，是因為國際社會一開始就委屈了它，沒有及早給它外交承認與合理的安全環境。<sup>7</sup>在中共與其他共黨國家檔案逐漸開放的今日，這樣的解釋確實已經無法令人滿意，這也是本書所要駁斥的。但本書強調中共外交以馬列主義加上受害者心態混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只是行動時常套上「國家安全」的包裝，也一樣無法完整解釋中共所有的對外行為。

一個國家的對外關係誠然會受到基本意識形態的影響，但也免不了理念與實際利益（不只安全考量，還包括其他如經濟利益、地區與全球影響力等）的糾葛。作者所描述蘇聯對待中共的態度，就是最好的例子。二次大戰之後，蘇聯雖然在理念上願意支持中共，但最大的關懷顯然是如何維持其在華利益（第一至三章）。陳兼因此批判說，對史達林而言，「革命只是攫取權力的手段，不是目標」，所以在蘇聯躋身「大國俱樂部」後，史達林就只想維持現狀了（頁4）。

比較之下，作者認為毛澤東對革命非常執著，不斷鞭策他的同志們「繼續革命」，一直到死前都還無法突破需要不斷尋找適當方法轉化中國的焦慮（頁11）。但他在各章中的描述，如毛澤東在內戰時期不放棄尋求美國的協助、對韓戰停戰條件隨著志願軍戰況的起伏而調整、對中南半島和戰的抉擇、對是否佔領金馬外島的彈性，以及與美國談判或關係正常化的折衷態度等等，在在顯示毛像史達林一樣是個「識時務者」，不會為了堅持意識形態而

---

分子，以及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的方式，製造出逼人的形勢，使不同意見者不得不極力迎合。1950年代動員的方法，可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初版），第八章，〈向共產主義天堂邁進〉之描述。

<sup>7</sup> Arthur Waldro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pp. 391-407.

在對外關係上缺乏彈性；尤其毛在中共終於進入聯合國，以及尼克森到北京「朝貢」後，躊躇滿志的表現（頁 272-273），加上從韓戰開始就積極在國際舞台上求表現，並爭取與美國談判，到不斷要求提高談判的層級，更顯示毛也想取得美國的承認，躋身「大國俱樂部」，進入世界權力的核心。<sup>8</sup>至於中共介入越戰與對越盟的態度，尤其是希望統一後的越南尊重中國較崇高的地位，等於想創造現代版的中土與朝貢國的關係（頁 237），顯示中共在政權鞏固、國力強大後，對於較弱小國家的態度，多少有像其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這點其實並不令人詫異，所以陳兼批評史達林的話，也可以用在毛的身上。這就是為什麼自我流放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會想問毛：「您老是不是真相信馬克斯的共產主義，那理想國？還是用來做個幌子？」<sup>9</sup>

另外，陳兼對毛澤東的描述，儘管細膩分析了他的心態、焦慮與必須從他所要打倒的傳統中去尋找革命語言的無奈，但還是略嫌簡單化。在他的筆下，毛是一個有理想的革命家，堅持革命理念數十年不變；他國內外政策作為，都是爲了要實踐他轉化中國的理念。他希望建立中國成爲普世正義與和平的國度，又可以居世界中心的地位；他屢屢發動武力，不是爲了侵略，而是爲了「維護正義」。他強調中國不是擴張性的國家，讀者（尤其西方的中國觀察家）應該要仔細區別中國「追求中心地位」與帝國主義「追求主宰地位」的不同——對毛與他的同志而言，擴張領土的層次太低（頁 15）。換句話說，毛澤東轉化中國的理念非常堅定，而且心中有清楚的整體策略，外交政策則主要是實踐這些理念的工具。

<sup>8</sup> 陳兼指出，中共當時認爲國際關係的標準是西方所訂，對革命中國有害。毛的中國有自己的價值與標準，挑戰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強權、甚至蘇聯（頁4）。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共雖然開國時對於美國以及世界的承認表示不在乎，說是要「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但也可以解釋成是自卑轉自尊的表現。實際上中共在爭取國際（尤其美國）承認與進入聯合國方面，還是不自覺地照著西方所定的國際標準在運作，只是對國內得說季辛吉與尼克森訪華：「不是因爲我們需要他們，而是他們需要我們。」（頁266）此點倒符合後殖民主義者所形容的「受害者心態」——即對西方「帝國主義」所創造的國際關係模式愛恨交加，不自覺地期望能被這個它所憎惡的國際秩序所接納。

<sup>9</sup> 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406。

這樣的描述至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讀：一是林蔚(Arthur Waldron)所譴責的：毛背叛了他自己宣稱的民主理念，因為他顯然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sup>10</sup>此點或許很多人會有同感。另一是陳兼意在巧妙反駁 1990 年代初冷戰結束以來，一度在西方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sup>11</sup>然而陳兼似未考慮到：毛是否有改變的可能？難道他革命數十年，理念與想法像鐵板一塊完全沒有改變過，就像他所想塑造的「社會主義英雄」一樣地對革命的奉獻始終如一，毫無成長過程？<sup>12</sup>難道中共政權的鞏固與國力的日漸強盛，都沒有動搖或改變他的理想？難道毛澤東真是如此「料事如神」，可以完全掌控對外局勢的發展，所以才能不斷藉著挑起或擴大對外的緊張局勢，以達到國內動員的目的？

爲了對毛外交決策有圓滿的解釋，陳兼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彌補了決策過程史料的不足，將毛處理各個危機的過程，都描述成慧眼獨具的大革命家與胸有成竹的大策略家，在採取所有行動前均有堅定的目標，行動時則能靈活運用策略，所以他的對手，包括美、蘇、北越領導人等，都只能被牽著鼻子走。如此將毛的決策過程加以簡化與理性化，讓政策容易理解與評斷，確實使作品簡潔、易讀，但不見得完全反映史實，甚至會在不自覺中創造了迷思。

一般而言，選輯出版檔案都有一定的方針。美國國務院出版的外交文件選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尙且有合理化美國政策的傾向，

<sup>10</sup> Arthur Waldro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p. 392.

<sup>11</sup> 1992年12月6日發行的《亞洲週刊》，在一篇題為〈中國威脅論〉文章中指出，中共蓬勃的經濟發展現狀和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使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正爲中國大陸的「富強」及可能帶來的威脅擔憂，一場針對中共的「新冷戰」已經來臨。這篇報導引起中共的反駁與學術界的討論。見《聯合報》，1992年11月29日，第10版。討論可見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lishing, 2000);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eds.,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2)。

<sup>12</sup> 余敏玲的研究指出，毛澤東時代塑造出來的社會主義英雄形象，都是「高、大、全」，天生具有階級意識，對革命事業有無私奉獻的精神，但人物平面化，沒有成長過程，也沒有轉折、衝突、變化。見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新史學》，卷12期4（2001年12月），頁61。陳兼所描繪的毛澤東，爲轉化中國的理想不斷焦慮、至死不悔，頗有這種平面人格的意味。



研究者需參考檔案館內的整體典藏，才可較完整地解釋華府外交決策的過程與執行的結果。中共政權在大陸仍舊實行威權統治，官方授權下經過篩選甚至修飾後出版的檔案選集，誠然可以稍微補充或修正以往只使用西方材料與中共的政策宣言或宣傳資料，來解釋中共對外行為的缺失，但要更完整、更圓融地解釋毛時代對外行為與政策，只怕還得等到檔案完整開放之後。尤其像毛澤東這麼會運用煽動性語言的人，更須格外小心甄別他說話的背景與外交決策的關係，以免因果倒置。使用選擇性出版的檔案或資料，也須考慮文件的背景與事件的進程，並審慎區別對內外宣傳、事後的反省或合理化，以及事前與當時的應變方式與想法。若將事後合理化的說法，當成政策設計，當然可以得出天縱英明的結果。

筆者雖然提出以上的質疑，作為商榷，並無意貶損此書已有的成就。有關毛政權外交政策的解釋，尤其是中國所謂的「受害者心態」，確實值得進一步探索與辯論。毛澤東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國人，但學界對他的了解，可能才剛剛開始。這本書為了解毛提供了相當吸引人的角度，值得學者們參考。